

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

——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分析之一

曹树基

无论在明代初年还是在清代前期的移民运动中，长江中下游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区域。概括地说，明代初年，主要是浙江、苏南、皖南及江西人口向苏北、安徽、湖北、湖南地区迁移；^①清代前期，则主要是以闽西、粤东客家人为主体的人口迁入湘、赣、浙三省丘陵山地，^②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及客家人迁往四川及陕南。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研究对象，本区人口迁往其他地区的不在讨论之列。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移民迁入新地以后人口自然增殖过程和特点，揭示人口的机械迁移和人口的自然增殖之间的关系，这既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认识中国人口的运动特征，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和理解。

用族谱资料进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台湾学者的起步早、功力深、成果最为卓著。在氏族人口增殖与迁移的关系方面，1983年，台湾刘翠溶博士发表了《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一文，该文描述了氏族内部的人口膨胀过程，这种膨胀迫使氏族人口不断向外拓展空间，引发人口的迁移。这种迁移可能是长距离的，也可能是短距离的。本文则以人口迁移作为背景，研究迁入新地的移民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增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恰与刘翠溶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即研究了氏族人口增长——迁移——增长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国人口及社会结构的若干特征也就尽含其中。

一、资料和方法

历史时期的人口资料，除了记载于各种政府文献、地方志中的人口数字外，最大的资料当首推族谱。政府文献及地方志中的人口数字，是政府统计的人口数。在明代，就全国情况而言，只有洪武时期的人口统计比较可靠，洪武以后的人口大有脱漏，讹错太多。^③洪武时期，恰恰是移民迁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含移民迁入以后登记入籍的数字。以后的人口发展，政府统计中无法反映。到明代后期，“人口”为“人丁”所取代，“人丁”是一个纳税单位，完全脱离了人口统计的轨道。清代初期，人丁统计取代了人口统计，只有到乾隆后期，才有出现人口数字，这一数据却又是移民运动结束之后的数据。人口数据不能够反映这两个时期人口变化的特征，这是显而易见的。

① 参见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待刊。

② 参见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清代浙江丘陵山区的移民运动》，待刊。

③ 参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文献中的人口统计数据,往往缺乏对于各个地区的分项统计,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资料散失或湮没了。这就使分区研究具有更大的难度,尤其是对于同一行政区中不同地形上的人口研究,更是困难重重。

我把目光投注于散藏于各地的大量族谱。在长江中下游的浙、皖、赣、湘四省有幸收集到一批移民族谱,在苏北及湖北则收获甚少。这四省的移民族谱集中在长沙地区,江淮平原,赣西北丘陵山区和浙南丘陵山区,长沙地区和江淮平原是明初移民的集中分布区,赣西北和浙南是清代前期移民的密集分布地。通过对这四个区域移民族谱的研究,大致能反映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人口自然增殖的历史及特征。

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经过多次天灾或人祸,族谱存留至今完全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只要用于统计分析的族谱数量足够大,即样本容量有足够的大,我们就能根据族谱提供的数据,作出可靠的推论。这是现代统计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关键在于是否能收集到足够多的族谱用于统计分析。

族谱取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于一套族谱是否世系完整并且生卒记载完整,二者缺一则不可用于统计分析。据我所见,清代氏族的世系和生卒记载一般比较完整,明代以来有完整世系和生卒记载的就很少见。尤其是明初以来世系和生卒记载都完整的更不易寻觅。本文关于明代移民氏族人口发展规律的记述,由于所据样本大小,尚需以后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支持。

作氏族人口增长率的研究,第一步是要确定氏族的时点人口。用手工方式计算氏族的时点人口,是很复杂的工作,尤其在大批量资料处理的情况下,用手工方式去清点氏族某几个甚至某几十个时点的人口,是不可想象的浩繁和复杂。笔者借助电子计算机完成了这步复杂的统计工作,其指导思想是,假如我们需要了解几年的某氏族人口,令所有生年 $>n$ 并且卒年 $\leq n$ 的氏族成员为 n 年人口,即 n 年活着的人口。这样,我们可以轻易地指定 n 为任一所需要的年份,计算出我们所欲了解的那些年份的人口。

与现代人口调查不同,现代人口调查的时点以日为定点单位。如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以该年7月1日零时以前出生并活着的人口为准。由于族谱中许多人口缺乏月和日的记载,我们不得不以年作为时点标准。在历史资料的处理中,这种作法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不可能对卷帙浩大的族谱作全面的统计。对于卷帙大的族谱,笔者根据随机抽样原则,等距地从每一部族谱中抽取10—50%的人口作为样本,计算各氏族的人口增长率。当然,这种统计包括了对抽样误差的计算。较小的族谱一般作全面的统计。

族谱资料在人口记载方面的缺陷也非常突出。大多数族谱对于8岁以下夭折的儿童不予登录,8—19岁死亡者不录生卒年龄,所谓“未冠而殇不入行;长殇十六至十九;中殇十二至十五;下殇八岁至十一岁;七岁以下为无服之殇,行之不入则生终俱不载,所以别于成人也。”统计中,殇者一律作12岁处理,其生年根据兄弟生年推补计入。又由于女性人口一般无生卒记载,所以只能统计7岁以上男性人口。男性人口的增长情况也代表了全体氏族人口的增长情况,这是我们统计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为了表现出移民氏族与土著氏族在人口增长方面的差异,每一地区,我们都将土著氏族的人口增长与移民氏族作一比较。以期显示两类氏族及不同地形上人口发展的差异和规律。

二、明代移民人口的增长

根据族谱的收集情况,我们选定湖南长沙地区及安徽沿江平原作为分析的对象。

长沙地区地处南北东西交通孔道,是湖南的中心区域,兵家必争之地。宋元以来,战端屡兴,长沙受害,首当其冲。高宗四年(1130年),“金人陷潭州……金兵大掠,屠其城”。宋元之际,元兵南下,1276年,长沙城破被屠。二次战争之后,分别有政府组织的移民进入长沙、浏阳等地。元末战争几乎使长沙地区的人口损失殆尽,洪武初年,政府组织江西中部的人口迁入长沙地区,根据我的研究,洪武时期长沙地区人口中,86%的人口属于刚刚迁入不久的移民。长沙地区的移民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的移民。^①

安徽沿江平原,主要是江西北部饶州地区人口的迁入地,根据我的研究,元末战争使这里人口大量损失,洪武初年的移民占当时总人口的80%左右。^②就移民比重而言,比长沙地区略低一点,但仍然可属于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

长沙地区用于分析的族谱藏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几十种外来移民族谱,明代以来世系完整并且记载完整的仅查得5种。族谱按“房”排列,一些残缺不全的“房”亦一并排除,就有表1和表2。

在以25年为一段的时间序列中,十六世纪上半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左右,至十六世纪下半期人口经历了下降又略回升的波折,至十七世纪初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经历了11%左右的较高速度后,又出现负增长。在25年一期的人口增长过程中,起伏交替发生,规律并不明显。

表1 长沙地区氏族明代男性的变化

项 时 目 时	<1>	<2>	<3>	<4>	<5>	Σ	置信限
1450	—	—	25	—	2	—	—
1475	—	10	35	—	3	—	—
1500	25	12	30	55	5	127	±1.3
1525	41	14	60	55	7	176	±1.0
1550	45	20	65	100	11	241	±1.2
1575	50	18	55	90	12	215	±0.5
1600	55	34	35	100	12	236	±0.8
1625	95	58	5	145	9	312	±2.0
1650	80	36	10	140	16	282	±1.2

资料来源: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1906年《宁乡萧氏五修族谱》文钰支系,支巨支系,支礼支系,支韶支系,支宝支系;

<2>1891年《中乡篁奇林贺氏三修谱》;

<3>1862年《长沙方氏支谱》;

<4>1895年《中湘沙塘周氏五修族谱》鉴宣、瑾、海、渊、灏共5支系;

<5>1910年《善化廖氏三修族谱》。

① 参阅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参阅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待刊。

表2 长沙地区5个移民氏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代	年平均增长率 (%)	年 代	年平均增长率 (%)
1501—1525	13.1	1501—1550	12.9
1526—1550	12.7	1551—1600	-0.4
1551—1575	-4.6	1601—1650	3.6
1576—1600	3.7		
1601—1625	11.2	1501—1650	5.3
1626—1650	-4.1	1451—1500	5.20 ^①

资料来源：据表1计算。

① 这个数据根据〈3〉〈5〉两个氏族人口统计得出。

试以50年为一期，人口发展的阶段性就清晰得多，在十六世纪上半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弱；十六世纪下半期则呈下降状，为-0.4%；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呈3.6%的微弱增长。

从明代中期至明末，长沙5氏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不高，仅达5.3%。

再看安徽沿江平原。在无为县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查阅的百余种族谱中，找到明初以来世系完整而且记载完整的族谱共有5种。这5个氏族中，无为胡氏、周氏、枞川丁氏三族为移民，分别迁自徽州歙县、安徽桐城和江西鄱阳。怀宁焦氏和棠山（桐城）孙氏的开族祖只能溯至元末明初，很可能为外来移民，否则明代以前的世系不可能不提及。统计结果如表3，表4。

由于安徽5族明代世系人数较少，统计中没有采用抽样的方法，而是全面统计。表中可见，安徽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在以50年为一年的时间序列中，十五世纪上半叶为8.7%，下半叶增加到10.7%，尔后持续地下降至6.2%。若以一个世纪为时间段，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表3 安徽沿江平原5氏族明代男性人口化变

	〈1〉	〈2〉	〈3〉	〈4〉	〈5〉	Σ
1400	1	2	15	2	2	22
1425	2	3	18	2	4	29
1450	4	3	19	3	5	34
1475	4	3	12	2	14	35
1500	9	3	12	4	30	58
1525	14	6	7	6	26	59
1550	19	6	12	7	42	86
1575	15	9	10	8	55	97
1600	26	17	11	8	64	126
1625	31	23	16	6	59	135
1650	35	25	29	20	63	172

资料来源：

〈1〉1909年《怀宁焦氏宗谱》怀宁支系；

〈2〉1925年《棠山孙氏宗谱》；

〈3〉1873年《无为胡氏宗谱》；

〈4〉1946年《濡须周氏宗谱》；

〈5〉1893年《枞川丁氏宗谱》。

表4 安徽沿江平原5氏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代	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代	年平均增长率(%)
1401—1450	8.7	1401—1500	9.7
1451—1500	10.7	1501—1600	7.8
1501—1550	7.9		
1551—1600	7.6	1401—1650	8.3
1601—1650	6.2	1501—1650	7.3

资料来源：据表1计算。

从9.7%下降到7.8%。下降趋势也是显然的。

以安徽、湖南各5个氏族的人口增长情况作一比较，其一，两地移民民族在迁入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太高，半个世纪以后，人口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尔后持续的下降。其二，安徽5氏族人口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小，长沙地区的波动幅度则非常大。其三，从1501年至1650年的150年中，长沙地区移民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安徽沿江区。就是在1451—1500这50年中，长沙地区移民民族的人口增长水平也比安徽沿江区为低。（见图1）

两个地区人口增长水平与趋势的异同有其历史的和地理的背景。当移民迁入新地以后，由于新地空旷、荒凉，移民们革路蓝缕，辛勤垦殖，终于得以安家立身，繁衍后代，这一时期土地资源丰富、充足，足以使他们能够以正常或偏高的速度繁衍人口。经过几十年的拓垦，移民人口进入繁衍的鼎盛期，于是出现人口的高速度发展，这种发展经过一段时期后，无疑会受到生产水平及资源的制约，于是出现持续的速度降低期。尽管这样，由于人口基数增大，人口增长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可观。另外，由于土地资源和生产水平的限制，迅速的人口高增长必定带来接踵而至的人口低增长，适度的高增长也必定导致适度的低增长，即均衡的增长趋势。这就是二地人口增长波动幅度出现差异的原因。再者，由于长沙地区受到明末战争的影响，张献忠部队征战赣西、湘东，导致这一带人口的大量死亡，引发了清代初年的新的移民运动。安徽沿江区受明末战争影响不大，氏族人口并未出现大量的死亡，所以就明代人口增长总水平看，安徽沿江氏族人口增长快于湖南长沙地区。

可以将移民输出区氏族人口增长与移民接纳区氏族人口的增长进行比较。这里选择江西中部作为比较的对象。

长沙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表中统计的长沙五个氏族主要来自江西吉安、南昌、丰城等地。笔者在江西所阅几种族谱分布于赣中清江、新干二县，处于吉安、南昌之间，所统计的清江聂氏和新干刁氏在明代前期均有族人西徙，进入湖广、云贵等地。笔者视他们和吉安、南昌等地移民如出一辙，且因他们所居环境与吉安、南昌等地同，所以他们的口发展也大致与吉安、南昌等地区的人口发展情况相同。兹将二族男性人口统计如表5、表6。

聂氏、刁氏均为人口输出之氏族。如刁氏，宣德年间，就有5人外出。其中一人外出湖北荆州定居，一人外出云贵，一人外出四川。族谱记曰：“冲霄，明宣德二年丁未三月生。出外在湖广荆州府管下夷陵州临江市，成家繁昌。”刁冲霄在湖北一支人口的发展情况，刁氏族谱中未予记载，当然不可得知，由于我们研究的是特定区域内的家族人口，即通过家谱

表5 赣中聂习二族明代男性人口情况

	清江聂氏	新淦习氏	Σ	置信限
1400	10	20	30	±0.8
1425	20	30	50	±0.7
1450	90	45	135	±0.5
1475	150	55	205	±0.7
1500	150	65	215	±0.7
1525	160	75	235	±0.7
1550	190	85	275	±0.9
1575	160	80	240	±0.8
1600	160	70	230	±0.7
1625	130	80	210	±0.7
1650	140	85	215	±0.7

 $\alpha=0.05$

资料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903年《清江香田聂氏重修族谱》正谋支系
1875年《新淦习氏四修族谱》。

表6 赣中聂习二族明代男性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份	年平均增长率 (%)			年 份	年平均增长率 (%)		
	聂氏	习氏	Σ		聂氏	习氏	Σ
1401—1450	44.9	16.4	30.5	1401—1500	27.5	11.9	19.9
1451—1500	10.3	7.4	9.4	1501—1600	-0.5	1.0	0
1501—1550	4.7	5.4	4.9				
1551—1600	-3.7	-3.9	-3.6	1401—1650	10.6	5.3	7.9
1601—1650	-2.7	1.4	1.3				

资料来源：据表5统计。

中人口记载来研究区域的人口问题，就可以不深究逸出区域之外的家族人口。因此，前面所作和将作的各种统计仍然是有意义的。

再论聂氏。聂氏在明代前期至少有二人外出，其中某公，天顺六年出生，迁居湖北襄阳，与习氏比较，则外出人口不及习氏。因此聂、习二族在明代前期的人口增长上出现较大的差异。聂氏在十五世纪经历了人口的大发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7.5%；而习氏仅及11.9%。由于习氏外迁人口较多。故本土人口发展自然会逊于其他较少外迁之家族。十六世纪以后至十七世纪中叶，聂氏人口大致稳定，呈微弱的负增长，习氏亦稳定，近似零增长。有趣的是，二个氏族人口增长速度在十五世纪中已经趋于相同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实质上是某种规律的反映，即至十五世纪中，人口外徙的大潮停歇了，各自在封闭的本土发展自身人口，环境相同，增长速度也就相同。

将赣中土著氏族人口情况与长沙、安徽氏族人口进行比较，见图1。

比较中发现三点有趣的事实，其一，移民输出区的人口在移民外出的同时保持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然后迅速下跌，跌至移民接纳区人口增长的速度曲线之下。这似乎表明移民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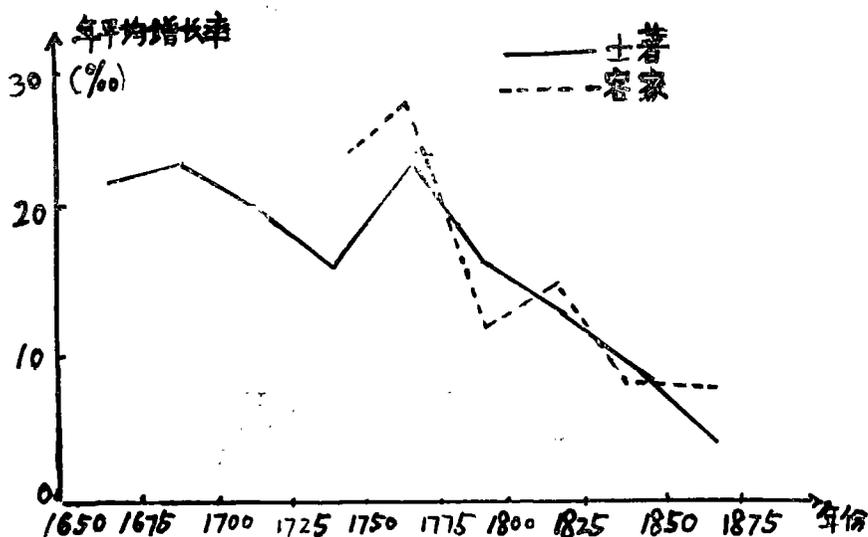


图1 安徽、赣中、长沙明代人口增长率比较

出地区的氏族努力生产人口，以适应向外移民的某种努力。就聂、习二氏族来说，明初人口输出并不很多，但同一区域大量的人口输出带来了生存空间的扩大似乎刺激了这两族人口的增长。其二，移民大潮一过，移民输出地氏族与输入区氏族同步发展各自的人口。前者速度稍慢于后者，反映出空间环境对生殖行为的制约。其三，处于同一地理环境中的长沙与赣中氏族人口发展的速率接近，与安徽比较，则差异较大，这说明在相同或近似的地理环境中，同一族群的生殖行为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只是根据新的环境略作一些调整而已。

以上研究所据样本虽少，但氏族之间与区域之间人口发展的规律性是如此清晰，使我们对上述结论有很强的信心。也希望有更多的资料来支持我们的结论。

三、清代移民民族的人口增长

清代前期长江中下游的移民运动，主要表现为来自闽西、粤东的客家人为主的移民，进入赣、湘、浙三省的丘陵山地。赣西北南部诸县和浙江南部丘陵山地是本节论述的重点，事实上，这二地正是清代移民主要的分布区域。赣西北南部的萍乡、万载、宜春三县客家人分布地形主要为较高的丘陵。笔者在江西省图书馆读到百余种客家移民的族谱，这批族谱残缺过多，世系记载完整者也不多。有《袁郡学前林氏族谱》记载了居住在萍乡、万载、宜春三县的三十余个林氏家族，这些家族先后迁自闽西和粤东的武平、镇远等若干县。有意思的是，这三十多个家族共同攀附唐宋某林氏为共同始祖，却令人生疑。我们认为这是客家林氏的一本合修族谱，实际上可以分成若干种族谱，另加其他族谱，兹统计如表7。

这几十个家族主要集中于宜春、万载二县。在宜春、集中于北部。在万载，分布于西部，处于二县“客家”移民的集中分布区中。1900年这几十个家族人口共达1 390人，同时期两县人口中，万载县有“客家”移民后裔共约15万人左右。宜春姑认为有5万，则共为20万左右。设其中男性人口占60%、为12万，此几十个家族之男性相当于两县“客家”人男性总

表7 赣西北客家移民若干家族男性人口

年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725	20	15	5	10		15			20	15		5
1750	35	20	10	15	5	30	10	15	40	15	5	25
1775	60	45	35	45	10	45	25	20	55	25	5	45
1800	50	75	50	40	20	50	40	15	55	20	15	90
1825	45	110	50	40	25	85	30	25	50	15	40	175
1850	75	135	80	15	55	75	20	50	45	10	50	165
1875	95	195	90	30	70	100	55	50	50	10	60	155
1900	80	165	55	35	70	60	60	50	55	20	80	100
$\alpha = 0.05$												

年 份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Σ
1725			10		10	5			5		10	145(±2)
1750	5	5	15	5	15	15	5	5	10	5	15	315(±6)
1775	10	20	35	5	20	35	10	20	15	5	25	615(±5)
1800	15	40	45	10	30	45	20	25	35	10	50	809(±5)
1825	25	70	35	20	45	45	30	40	65	25	70	1160(±7)
1850	40	80	30	25	45	45	55	35	80	25	165	1410(±8)
1875	40	80	35	25	55	50	75	45	95	50	190	1710(±9)
1900	55	65	35	15	85	50	60	50	95	50	190	1580(±6)

资料来源：1902年《袁郡学前林氏族谱》：

- | | |
|--------------------------------|-------------------------|
| (1) 宜春县莲塘魁才世系； | (18) 万载县松岭其烈世系； |
| (2) 宜春县莲塘魁贤世系； | (19) 万载县西坑燕山世系； |
| (3) 宜春县莲塘奇怨世系； | (20) 万载县黎源燕山世系； |
| (4) 宜春县亭子下可望世系； | (21) 万载县黎源祥彩世系； |
| (5) 黄陂坑锡文、恒田锡贤世系； | (22) 萍乡县孔禄世系； |
| (6) 宜春县金瑞上桂世系； | (23) 1937年《萍北夏兰戴氏三修族谱》。 |
| (7) 宜春县零江桥白聪世系； | |
| (8) 宜春县上了山锡瑶、自任世系； | |
| (9) 宜春县魁山、南庙东庄、新坊受尚，西村估洲、魁纯世系； | |
| (10) 宜春县赞塘习正世系； | |
| (11) 宜春县乌山荣新，下巩荣蛟三山世系； | |
| (12) 万载县梓塘坑上献、上春、上伯世系； | |
| (13) 万载县沙滩上云山世系； | |
| (14) 万载县包家山桂崇世系； | |
| (15) 万载县山田坳藻、仕玉世系； | |
| (16) 万载县大仓下行宗世系； | |
| (17) 万载县桃树坑汉伯、黄草坪汤伯世系； | |

数的1,2%左右。设赣西北“客家”男性总数为30万，这几十个家族男性亦占其0.5%左右。从抽样角度说，样本所占比重并不太低。又根据赣西北萍乡、奉新、万载几部土著族谱，对土著人口的统计作为“客家”移民的参照系。

根据表7、表8统计，将土著、客家人口的不同增长情况计算列如下表9。

表8 赣西北土著回氏族清代男性人口

年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Σ
1650	45	5		5	5	5	10	10	15	10	15	20	100(±1)
1675	20	15		15	5	5	15	10	10	25	10	30	170(±2)
1700	15	80	10	35	15	15	25	10	20	30	15	40	310(±3)
1725	30	145	15	60	30	45	30	20	10	45	30	50	510(±3)
1750	40	180	20	80	50	95	75	30	40	70	25	50	755(±2)
1775	80	260	20	140	60	200	160	70	55	180	40	70	1335(±2)
1800	135	270	40	205	100	330	205	100	80	315	50	100	2020(±2)
1825	165	230	70	265	120	475	495	230	125	485	45	125	2830(±2)
1850	155	155	50	275	125	695	720	390	190	640	40	135	3570(±3)
1875	175	85	65	315	115	765	775	450	255	775	35	160	3970(±2)

$\alpha=0.05$

资料来源:

- (1) 1908年《萍乡石源李氏家谱》;
- (2) 1920年《奉新帅氏重修族谱》;
- (3) 1898年《萍乡古学前彭氏三修族谱》;
- (4) 1875年《万载辛氏幼房谱》应锡世系;
- (5) 同上应运世系;
- (6) 1875《万载辛氏幼房谱》应煌世系;
- (7) 同上应武世系;
- (8) 同上应光世系;
- (9) 同上应文世系;
- (10) 同上汤铭世系;
- (11) 同上应翔、应展世系;
- (12) 同上应衢、应原、应环、应举、应徽、应璋世系;

表9 赣西北清代土客人口增长比较

年 份	“客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土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651—1675	—	21.5
1676—1700	—	23.0
1701—1725	—	20.1
1726—1750	22.0	15.8
1751—1775	27.1	23.1
1776—1800	11.0	16.7
1801—1825	14.5	13.4
1826—1850	7.8	9.3
1851—1875	7.7	4.3
1651—1700	—	22.2
1701—1750	—	18.0
1751—1800	19.1	19.9
1801—1851	11.2	6.8
1651—1750	—	20.1
1751—1850	15.2	13.4

资料来源: 据表7、表8计算。

由于赣西北客家移民的历史较短, 在50年为一年的时间序列中难于表示百余年的人口发展, 所以采用25年段划分时间。从图2中可以看出(1)无论是土著还是客家, 在氏族人口增长速度达到顶点之前, 都经历了一个准备期, 这说明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 人口增长经历了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移民迁入之初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这和明代长沙、安徽的情况类似。(2)客家移民迁入后形成的人口高速发展时期, 也正和土著高速发展期的尾声对应, 但总的速度水平以移民为高。此之前, 土著人口一直以15.8—21.5%的速度增长。此之后, 无论客家还是土著, 人口的增长速度呈持续地下滑状, 土著人口的下滑呈近似直线的运动, 客家人口增长则有跌宕起伏。透过这一现象可以认为虽然赣

西北土著客家一同居住于丘陵地带, 但移民居住的地形显然要高, 这一点我在以前的研究中作过详细的论述。在占有资源方面, 土著人口有相对强的优势, 他们的人口发展过程也就相对平稳。客家相反, 大多客家作为佃农招入, 顺利地购得土地的客家人毕竟是少数, 因而人口发展上的困难就相对的多。(3)在达到人口增殖的顶峰之后, 土著、客家人口变化趋势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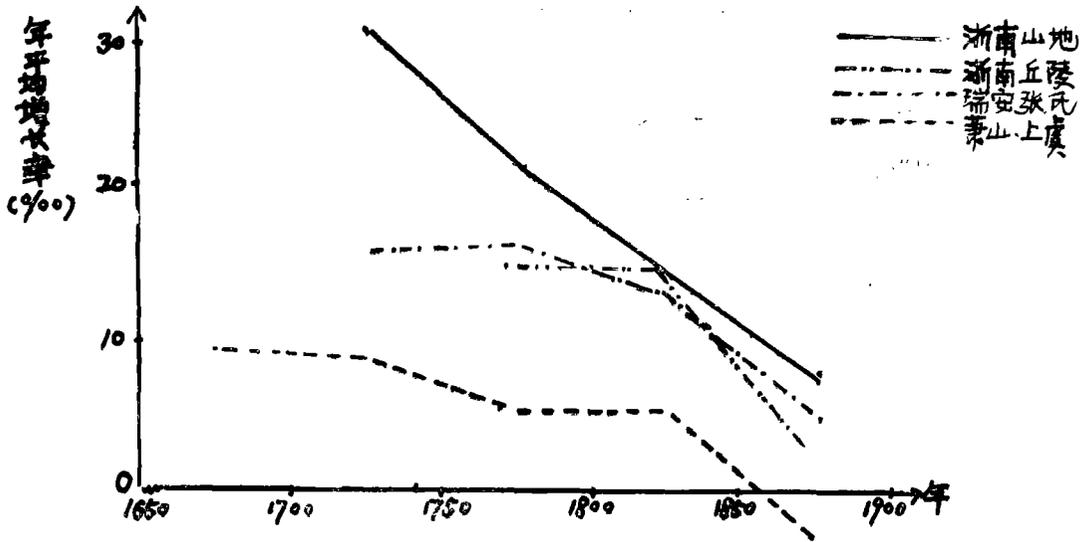


图2 赣西北土客人口增长率比较

着时间推移，愈来愈趋于同一。这是因为两类人口所处地理环境大体相同，故其人口发展必定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同一性质。（4）与明代比较，清代移民人口增长率要比明代移民增长率高出许多，这与清代人口发展的大背景一致。

处于不同地形的移民氏族人口发展情况到底如何呢？赣西北由于缺乏能确指为山地的移民族谱，无法解答这一问题。1987年夏天，我在浙南山区进行移民历史的调查工作，在云和县图书馆获读了一批移民族谱，但山地族谱不多，世系记载完整的更不多。我在江山县及龙泉县山地作农家调查时又获读一批移民族谱。在遂昌县农家所获族谱，多为丘陵地区农民所藏。在温州市图书馆及浙江省图书馆获读一批浙东南丘陵区及浙东平原区的土著族谱，用作比较，丘陵山地各类族谱的男性人口统计见表10、表11。

综合表10表11，计算各自移民人口的不同增长率如表12：

在丘陵地区，移民迁入伊始，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28%左右。尔后百年降至14%左右；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人口高增长的势头被打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仅保持很低的增长率。

在山地，客家移民迁入后50年的增长率保持30%左右的高速度。再后50年，降至21%左右，再后50年，降至14%左右。与丘陵区比较，移民迁入后一段时间中的增长速度以及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增长速度大抵是相同的。由于山地的空旷程度甚于丘陵，故其人口增长之势头不象丘陵区一般跌落得那么厉害，经历了一个渐次下降的过程。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对山地的影响较小，山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渐次下降，这与丘陵区的情况有不同。

以50年为时间段，将浙南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和赣西北移民及土著人口的增长情形作一比较。其一，浙南山地移民氏族的人口发展类似于赣西北移民氏族，在他们迁入之初，人口增长高于土著或居住地环境较好的丘陵地区移民，以后人口增长速度迅速降低。其二，浙南丘陵移民氏族在迁入之初很短的一个时期，曾有过高增长，尔后下跌至一个中等的速度，较稳定

表10 清代浙南山地客家移民家族男性人口

年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Σ
1700	—	—	9	6	—	3	3	3	—	—	—	21(±1)
1725	—	4	23	13	3	6	9	16	3	—	3	80(±1)
1750	—	4	49	9	6	6	13	19	3	2	2	113(±1)
1775	3	29	73	26	13	23	23	32	3	4	4	233(±1)
1800	13	44	86	39	16	23	36	49	9	7	6	328(±1)
1825	19	39	93	53	43	39	59	79	33	10	14	481(±1)
1850	53	29	83	56	46	53	102	142	69	12	23	668(±1)
1875	85	14	99	69	43	76	146	186	109	17	27	871(±2)
1900	132	17	96	79	56	76	129	175	143	33	24	960(±2)

$\alpha=0.05$

资料来源:

- (1) 1941年江山县《须江邹氏宗谱》杨泰系;
- (2) 同上挺旺、葵芳、淑景三系;
- (3) 1920年江山县《须江张氏宗谱》;
- (4) 1930年龙泉县《巫氏宗谱》有光有显二系;
- (5) 同上李车坑巫氏;
- (6) 1932年龙泉县《豫章罗氏宗谱》;
- (7) 1921年云和县《太原郡王氏宗谱》;
- (8) 1919年云和县《溪侯门颜氏宗谱》;
- (9) 1932年云和县《陇西李氏宗谱》蒲潭、桑溪二系;
- (10) 1922年云和县《武威郡石氏宗谱》;
- (11) 1932年云和县《木垌刘氏宗谱》;

表11 清代浙江南部丘陵地区 8 移民民族之男性人口

年 份	(1)	(2)	(3)	(4)	(5)	(6)	(7)	(8)	Σ
1725	5	—	—	5	—	5	35	40	90(±1)
1750	10	5	5	15	—	10	65	90	190(±1)
1775	25	5	15	15	10	5	55	125	295(±1)
1800	45	10	30	105	25	25	65	105	410(±2)
1825	50	20	35	130	35	50	110	125	555(±2)
1850	100	25	70	165	50	85	140	200	835(±3)
1875	105	60	115	125	45	100	160	160	870(±3)
1900	120	90	145	130	40	135	130	160	950(±1)

$\alpha=0.05$

资料来源:

- (1) 1944年遂昌县《平昌高氏宗谱》万道、万贤、万良、万顺四系(其中二支居住江西玉山县);
- (2) 1943年遂昌县《湖山吴氏宗谱》湖山前店坪系;
- (3) 同上湖山潭溪系;
- (4) 同上湖山黄兆系;
- (5) 同上湖山后溪系;
- (6) 1948年遂昌县《钟氏宗谱》;
- (7) 1922年云和县《江氏宗谱》;
- (8) 1931年常山县《朱氏宗谱》大塘三叉坞、冈背上、窝塘、西安上方及寿昌六系。

地匀速地发展自己的人口,这有类于赣西北丘陵区的土著人口发展情况。其三,十九在世纪上半叶,浙江山地、丘陵移民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趋于一致,有类于赣西北地区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移民和土著氏族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同。这是一个条件大体相同的自然环境对人口增长产生限制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这种地理差异扩大,上述规律就看得更加明显。以浙江为例,选择浙在瑞安县作为丘陵区参照样本,选择萧山、上虞两个浙东平原县作为参照样本,结果如表13、表14。

浙东南沿海丘陵区的人口增长与浙南遂昌、云和及常山一带的人口增长情形基本相同。瑞安张氏为土著,世代定居此。在明末清初,由于“三藩之乱”,这个家族外逃,战后返回故里,重新开始建家立业。在记清初某公时,族谱有言:“生明季鼎革之时,不求仕进,隐居蟠江。又逢山寇被猖,耿逆扰攘,奔走逃避,曾无定居。逾海内升平,仍故归里。”自此之后,氏族人口增加,这和移民迁入遂昌、云和、常山的情形是一样的。两地相距甚远,居住地的地形条件却是差不多的,所表现的人口增长规律是一样的。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口增长的势头大幅度跌落,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结果。

萧山、上虞一带平原区的氏族人口增长,与山地、丘陵有很大的不同。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其人口增长速度不高,尔后渐次降低。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降至5.2%的低水平,较丘陵区相差十几个百分点,较山地差得更多。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太平天国战争,

表12 清代浙江山地、丘陵移民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比较(%)

年 份	山 地	丘 陵
1701—1725	47.5	
1726—1750	13.2	28.1
1751—1775	28.8	16.4
1776—1800	13.7	13.3
1801—1825	15.4	12.1
1826—1850	13.2	16.4
1851—1875	10.7	1.6
1876—1900	3.9	3.5
1701—1750	30.9	—
1751—1800	21.3	14.9
1801—1850	14.3	14.3
1851—1900	7.3	2.6

资料来源:据表10和表11计算。

说明:有些年份因有些氏族尚未迁入,无人统计,计算这些年份的增长率时除去这些氏族不计

表13 浙江萧山、上虞、瑞安三地4氏族人口变动

年 份	(1)	(2)	(3)	Σ	(4)	(5)	(6)	Σ
1600	60	20	30	110	—	—	—	—
1650	150	50	15	215	—	—	—	—
1700	240	70	30	340	10	5	20	35
1750	380	100	40	520	40	15	20	75
1800	450	160	65	675	105	30	30	165
1850	570	110	195	875	195	50	75	320
1900	520	90	140	750	210	45	110	365

资料来源:

- (1) 1898年上虞县《湖塘陈氏族谱》;
 (2) 1921年上虞县《屠氏宗谱》;
 (3) 1928年萧山县《萧山张氏宗谱》;

- (4) 1926年瑞安县《张氏宗谱》人房荆公世系;
 (5) 1926年瑞安县《张氏宗谱》灭房异公世系;
 (6) 1926年瑞安县《张氏宗谱》地房尧公世系。

表14 浙江萧山、上虞、瑞安三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份	萧山、上虞氏族	瑞安张氏
1601—1650	13.5	—
1651—1700	9.2	—
1701—1750	8.5	15.4
1751—1800	5.	16.0
1801—1850	5.2	13.4
1851—1900	-3.1	2.7
1601—1700	11.3	—
1701—1800	6.8	15.7
1801—1900	1.0	8.0

资料来源：根据表13计算。

人口出现负增长。

浙江不同地形氏族人口增长率的比较可从图3中一目了然。

就人口增长率的高低而言,山地、丘陵、平原依地形降低而其人口增长速度依次降低。规律十分明显。就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山地表现为直线下降而丘陵平原则为相对平稳地下降。浙地各地各类型氏族的人口发展速度趋于接近或一致,如没有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到二十世纪,各类氏族人口增长速度完全可能在年平均增长5%的基点上统一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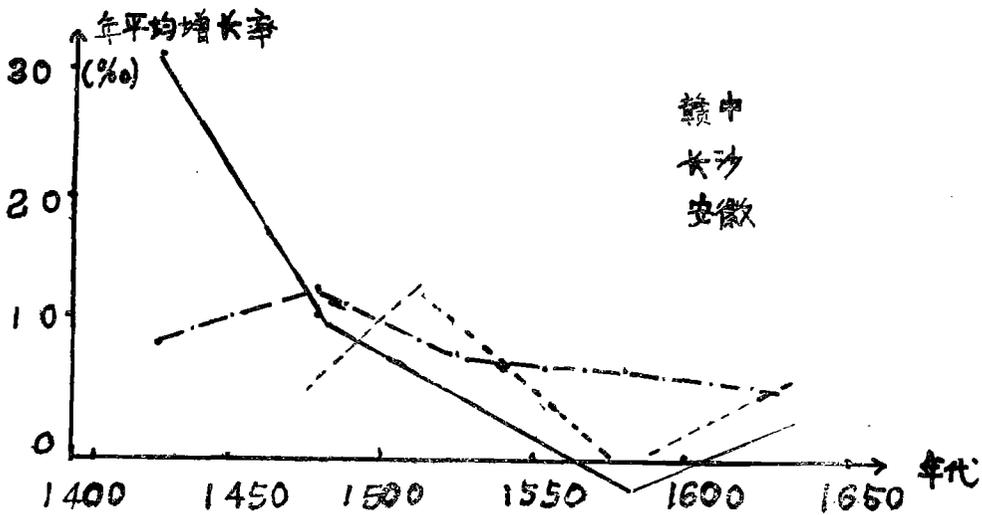


图3 浙江不同地形氏族人口增长率比较

四、简短的结论

一,从明代湘赣二地的情况看,人口输入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高于人口输出区,这固然是因为移入区的人口生存空间大于移出区,但人口输出区在移民运动发生的初始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外移使得留居土著的生存空间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移民运动能够缓解移民输出区人口压力的观点并不全面。因为,这种缓解是短期的,留居土著的高速繁衍很快就可能使移民输出的巨大的成果化为乌有。明清两代的朝代更替依靠的是武力征服,是残酷的战争。战争之后紧接着移民填补残破,移民之后紧接着移民人口高速繁衍,以后又是朝代更换,战争、移民、增长交替出现,形成了循环,移民只是这个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二、因地形不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明显的差异。即使是移民聚居的同一区域也是如此。地形相同，人口背景相似，即便不是同一地区，人口的变化趋势和增长速度也会大体一致。清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丘陵山地普遍接受移民，平原地区很少或几乎没有。所以，清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高低往往与地形高低成正比。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丘陵山地，尤其是山地，大都在清代移民进入后才得以普遍的开发，这种开发伴随着的是人口的高速度发展，人口的高速度发展引起了开发强度的不断提高，最终导致生态的破坏，山地的水土流失迫使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放弃一些已经占据的空间，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不得不放慢。所以，和丘陵、平原区比较，山地人口最初发展速度最高，下降幅度也最大，尽管如此，总的速度仍高于丘陵和平原区，这是由其人口背景所决定的。

三、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运动使这一区域的人口分布得到一次大调整。大批移民从人口的高密度地区移入人口稀少甚至人口的空白区，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增加。在这个基础上，移民人口出现高速度增长，使得移民接纳区和人口输出区人口密度的差距迅速地缩小。明清时期的移民运动正是借助于人口的高速繁衍从而对人口的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解理明清时期移民运动的真正内涵。

(上接第160页)

近代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租佃关系.....	陈廷煊	4/42
江南丝绸业历史综述.....	徐新吾、张守愚	4/56
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例.....	黄宗智	3/89
五十年代我国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	董志凯	1/1
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宏观管理.....	武力	4/1
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龚建文	4/9
1952—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领域个人收入分配方式的历史变革.....	戴银秀	3/7
中国工资水平发展史的数量分析（1953—1987）.....	段宾	3/20
读者·作者·编者：		
恢复时期我国外贸政策未曾“大进大出”.....	俞恺	3/79
“不患贫而患不均”说商兑——兼论孔子的经济思想.....	李衡眉	4/146
从祁门县《新文亲供首状》所见.....	江太新	4/150

论 著 评 介	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读严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下卷.....	陈翰笙	1/43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丰收硕果.....	张仲礼、潘君祥	1/44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评介——兼谈如何评价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作用.....	刘克祥	1/46
	清代的土地开垦与社会经济——《清代土地开垦史》述评.....	陈锋	1/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评介.....	诸班师	2/158
	《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1—1937）》.....	息圃	2/159
	民族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朱家桢	3/148
	岸本美绪评清代物价史研究现状.....	许檀	3/153
	探幽揭微、蹊径独辟——陈慈玉博士所著书两种评介.....	夷贞	4/152
	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张立耀	4/158